

當代社會變遷之中的基督宗教

卓新平

[提要] 基督宗教在當代發展中正面對“全球化”、“世俗化”和“多元化”的種種挑戰，其古典形態已留存不多，甚至因其本土嬗變而幾乎面目全非；雖然自二十世紀初開始的基督宗教信仰整合沒有根本完成，其作為世界第一大宗教卻必須以其信仰宣稱來對上述挑戰作出表態和應對。特別是在當下中國處境中生存與發展的基督宗教，更需回答關涉其目前定位和未來走向的“全球化”、“中國化”諸問題，在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體現出其意向和努力。對此，基督宗教“普世”發展的經歷和經驗，可能會對“全球化”、“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走向提供啟迪和借鑒。也正是在這種思考和應對中，基督宗教則會給中國與世界，以及其信仰本身帶來新的機遇和未來希望。

[關鍵詞] 基督宗教 全球化 中國化 一帶一路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 B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4 - 0072 - 09

當今世界的人際關係是前所未有的密切，而形成共聚之人的思想文化卻是前所未有的多元複雜。社會共在使矛盾對抗加劇，也使對話瞭解機遇增多。基督宗教作為“大一統”的信仰體系，經歷了約兩千年的整合共融，但在“全球化”面前卻發現國際社會的信仰文化乃如此多元，其溝通、對話的任務是如此的巨大、艱辛。在基督宗教視野下的中國與世界都如同萬花筒那般絢麗多彩，已經目不暇接，而中國與世界視域中的基督宗教表面看似清晰卻有著深層次上的模糊，很難根本看透、說清。這裡，現代社會與基督宗教都有著自我反思和彼此認知的當務之急，其關係的妥善處理和積極調試，將影響到世界的走向與人類的未來。概言之，基督宗教在當代社會變遷中必須理順一些重要關係，其中涉及世界發展變化的包括“全球化”問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而直接與中國當代發展相關聯的則有其本身的“中國化”以及對“一帶一路”發展合作的參與問題。

一、基督宗教與“全球化”

只是步入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自以為早就進入“全球性”發展的基督宗教才真正領悟到什麼是“全球化”景觀。它由此經歷了從其地域性、局部性關注到對人類全球性存在及其相關問題

之注重的重大轉型。美國學者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和斯馬特（Ninian Smart）曾論及一種“全球化宗教探究”^①，由此提醒人們要認真注意到其普遍關聯。基督宗教在其跨國度、跨民族發展上曾經引領了這一全球化潮流，故而曾憧憬某種“基督化時代”的到來。不過，現實景觀卻給這種樂觀情緒潑了一瓢冷水，今天的“全球化”並非基督宗教的全球化，甚至過去樂於將美國夢與全球化相結合的基督宗教美國在今天也有了猶豫和動搖，開始嘗試與之不同的退出國際合作之“逆全球化”選擇。現實世界的多元混雜使基督宗教作為“全球化宗教”的身影開始顯得模糊，多種宗教的競相發展引發了新的張力，而思考著究竟什麼是全球化的宗教特徵之斯馬特已經感覺到“一種即將來臨的全球性文明”^②與以往不同，人們在失去對未來的把握及信心。

與基督宗教的全球發展極為相似，當代世界的各種宗教都已經不再是分塊的、隔斷的單獨存在，而是有著這種全球性普遍關聯，任何宗教都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形成世界級震盪。以往所謂世界宗教與民族宗教的劃分已經落伍，不少原屬局部性的民族宗教實質上都有了世界宗教傳播的規模和速度。正是這些宗教的世界性、全球性擴散，形成了新的競爭、衝突和較量。儘管有著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世界宗教和平運動的努力，宗教之間的張力並沒有根本消滅，其全球化對話的需求越來越緊迫。與全球化發展相對應的，則是繼政治、軍事的衝突之後，“文明的衝突”緊接著登臺，其根源性的經濟問題、社會不公卻被掩蓋。這樣，人們在全球化的時代有了更多的猶豫、彷徨和惆悵。“全球化”走向何方，這對於作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基督宗教既是問題，更是責任。在這種“全球性”緊張之中，基督宗教不能加劇這種張力，而應該以其能力和影響來消滅、緩釋世界的緊張局勢，但基督宗教的這一責任意識似乎並不強烈，甚至很不明顯。實際上，對話的聲音在弱化，以往大國對世界的“責任”和“擔當”在出現嬗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以及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對流使國際關係趨於複雜，世界正向著越來越危險的方向滑動。如果基督宗教不能在這種危機之中選擇正確之途，不能引導世界走向緩和與共處，其世界第一大宗教的使命則會終結，而其信仰的“大一統”共在也會分化瓦解，成為回返局部利益、狹隘民族主義或地方保護主義的精神代言，其結果恐怕則是“基督化時代”的真正結束。

回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基督宗教曾經引領了當時世界範圍的對話，不同宗教之間、不同政治利益之間以及不同思想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衝突得以部分消解，其中基督宗教的作用非常明顯，人們對基督宗教的“普世合一”運動也有著足夠的信心。那是“全球化”開始萌芽的時期，特別是以科技發展為引擎、以信息網絡為特徵的全球化會將人類引向何方，人類並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或較為清晰的預案。本來，伴隨著全球化到來的“冷戰”結束給人們帶來了和平對話的希望，宗教的重新活躍使人有著“第二軸心時代”（the Second Axial Age）的期望，但僅從當今宗教發展的實際來看，其相互排斥對立似乎在加劇，文明衝突意義上的對抗也在逐漸升級；以前政治對立的戰場明確、陣營清楚，兩大政治集團的雙峰對峙使國際關係反而簡單明朗，但現在卻出現到處是戰場、人人會自危的局面；暴恐活動給人帶來了冤家窄路相逢的絕望，不知何為淨土、何處安全，不得不擔心隨時隨地都可能禍從天降；而其衝突、對抗之精神背景中的宗教因素更是讓人震驚、沮喪。在這種新形勢下，各宗教尋求和平的努力沒有形成合力，各自零散的聲音也不具備和聲的規模，基督宗教亦尚未起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那種呼喚、引領的作用。如果找不到和合共生之道，政治、民族的分歧就可能失控，最終導致偏激者借助高科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毀滅這個星球。因此，“全球化”是對基督宗教生存及其作用的巨大挑戰，也是其如何面對危機並化解危機的重要機遇。

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Hans Küng）在論及基督宗教的全球發展時曾提到其“範式的轉變”，為此，他認為面對世界的全球化發展不僅需要基督宗教自身的“普世信仰”，而更為迫切的則是要儘快創立一種“全球倫理”（Weltethos），因為“這種倫理為一種更好的個人秩序和世界秩序提供了可能，這種倫理引導著個人擺脫絕望，引導著社會擺脫混亂。”^③孔漢思意識到，基督宗教在全球化的世界已不可能唯我獨尊、包打天下，也不可能建立一種以基督宗教為主導的“統一宗教”，因而只能以一種普世宗教神學的眼光來“不斷督促各宗教在未來著重強調共同的東西，少提造成分裂的東西”，由此“將現存的共同性提高到普遍的意識上來”^④。既然作為根本價值體系的宗教在建制上不可能整合，那麼首要任務則應該是找尋一種在各宗教教義中可能存在的“共同的核心價值”，在社會共有道德層面作為一種“世界倫理”來達成共識、實現聯合。這裡，孔漢思找到了基督宗教應對及適應全球化的基本思路，即不能做自命不凡的先知或頤指氣使的教主，而是通過“革新”和“自我改革”來達到“和睦”，通過“自我批評”來實現“寬容”。^⑤找到國際社會全球化關聯中共同生存的社會底線和價值共識，此乃當務之急，基督宗教理應意識到這一點，並須馬上採取積極的行動。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人類精神思想也出現了巨大轉變，局部思維必然會被整體思維所取代，單一的思考也勢必讓位於綜合考量。為了迎接並適應這個全球化時代，基督宗教需要一場思維革命，也有必要推動其新的範式轉變。在全球化思維上，基督宗教思想好像不太活躍，在二十世紀神學群雄相繼退出歷史舞臺之後，神學界幾乎陷入“萬馬齊喑”的窘境，人們在期盼著出現登高一呼的當代智者，渴望能看到巨星閃耀。所以，基督宗教不可被動適應或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對之表示沉默或抵觸，而應該有其主動、積極的全球化意識表達，以便能在方興未艾的全球化意識、生態保護意識、宗教多元意識和全球對話意識中獲得自己的凸顯地位和強有力的發聲。

二、基督宗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謂“全球化”實際上基於人類存在的整體意識和人類社會的共同體化這種全新發展。人類作為集體之在，其最大特點就是其共同體的存在方式。但共同體的意識乃經歷了漫長的嬗變和調適，這種以利益共同體為基準的發展經歷了氏族部落共同體、社會政治共同體、經濟合作共同體、宗教信仰共同體、民族國家共同體、跨國集團共同體、國際聯盟共同體等發展，大小變更、分合重組屢屢不絕。與全球化相伴隨的，則是相關共同體的不斷擴大並獲得全球性影響。這種共同體反映出人類不同的經濟文化圈文明，而這種文化圈認識恰好就是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論”的社會及時代背景，他認為正是在不同文化圈的交接之處容易產生碰撞、造成文明衝突。顯然，由文化圈所折射的共同體乃局部利益共同體，即以其相同的經濟、政治、民族、宗教信仰及文化利益訴求而形成聯盟、構成共同體存在，以便與其他共同體博弈、競爭。這種共同體所達成的統一、共構，既有和平整合、協商聯合之結果，也會通過戰爭、征服來取得，而全球化時代的利益共同體則更多是經濟需求並通過磨合使然。以歐洲為例，“長期以來，歐洲人一直在尋求著歐洲統一的途徑——宗教、文化、軍事、政治——就在多少政治家、軍事家試圖統一歐洲的宏圖大業相繼失敗之後，市場經濟的發展卻在悄悄地逐步地將歐洲各國的經濟融合在一起”，這種歐洲聯合的結果就是其經濟一體化，並以其經濟聯盟為基礎而莫立其軍事、政治等聯盟。^⑥在歐洲歷史上，基督宗教曾試圖建立其宗教信仰共同體，中世紀天主教信仰的整合成功曾使歐洲人緬懷過去、浮想聯翩。但這種信仰共同體在宗教改革、民族獨立、工業發展的大潮中已

被衝得四分五裂，蕩然無存。而今天方興未艾的人類共同體發展進程卻基本與基督宗教的存在無關，其信仰共同體只可能是多元宗教共在的共同體，以反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艱難險阻中的誕生及其披荊斬棘的發展。雖然，當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已經基本上與宗教無直接關聯，但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卻可以為這一當代人類共同體的構建獻計獻策、提供啟迪和智慧。基督宗教所保存的原始社團共同體、教會共同體及修會共同體存在，可以為今天的共同體建設提供經驗教訓，給出警醒和啟發。共同體得以存在的一大原則就是求同存異、包容他者，形成各宗教派別及其信眾之間對話寬容、多元通和、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良好局面。基督宗教作為迄今仍然最大的基督信仰共同體，在化解宗教衝突、構建共同社會上可以充分發揮其作用。

事實上，共同體的發展乃是尋求人類不同群體的共存，這就需要各自不同的人與人、社團與社團、社會與社會、宗教與宗教、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接觸、彼此溝通和共同合作。這對於宗教而言，只能是宗教對話、宗教共存，故此必須告別以往的宗教衝突和宗教戰爭。歐洲近代以來，基督宗教各教派之間、各勢力範圍之間曾發生過劇烈衝突和流血戰爭，只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以來，才出現了尋求共同存在與發展的“基督宗教合一運動”即“普世教會運動”，在此，基督宗教的所謂“普世”訴求，實際上就是基督教會的共同體努力。其經驗教訓當然也可以給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提供借鑒和警醒。基督宗教在這一運動中的名言“同一個世界或沒有世界”、“教義造成分裂，工作有利合一”，為當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及成熟亦營造了積極的氛圍，並在一定程度上緩減了其宗教中的矛盾衝突。基督宗教的現代合一意識，促進了其宗教之內、各宗教之間以及宗教與教外的主動對話，二十世紀的“教會作為共融”之處，曾為多元對話提供了重要平臺。也正是在這一語境中，孔漢思在爭取達成“全球倫理”時才喊出了“沒有宗教和平就沒有世界和平，沒有宗教對話就沒有宗教和平”這一振聳發聵的口號。今天我們要合力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基本前提就是要從對抗走向對話，從對立走向並立，從爭議走向共識。

在全球化的時代，以往的社會共同體顯然僅有局部意義，只是一種較小範圍利益集團的共存，從而很難避免在更大範圍中的爭奪和衝突。因此，今天的世界共存之唯一出路，只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建，已經別無選擇。對此，有著普世教會之合一運動的基督宗教，實質上在全球規模之小範圍內曾起過先鋒探路作用，其經驗教訓都彌足珍貴，值得今天認真開發和借鑒。而今人類共生存、同命運的時代已經真正到來，曾具有先知般遠見及努力的基督宗教不應後勁不足，而需發掘、調動其潛力來積極應對。

必須看到，現代社會的世俗化已給基督宗教造成了直接的衝擊，其社會作用和世界影響已經明顯在減退，如果基督教會在當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建中不挺身而出、反而急流勇退，其頹勢將不可避免，其處境也會每況愈下。從世界全域來審視，基督宗教好像對之仍然處在十字路口，有其猶豫不決或動搖彷徨。對於這種麻木或茫然，需要及時呼喚和叫醒。在基督宗教的精神資源中，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肯定及支持，可以表現在多個方面，如其信仰觀念中“與神共在”這一神與人的共同體世界，會使其視野開闊、境界超越，有助於克服局部自我的局限性，而有關照他者的全域綜觀；其教會作為“神聖聯盟”的意識可以幫助其超越自我、揚棄傳統觀念而尋找更為廣泛、更大涵括的神聖意義及神聖價值；而其遍及全球的教會存在也可跨出自身教會的藩籬而爭取文明對話、文化溝通上的更多合作與聯合，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實現奠立堅實基礎，創造有利條件。因此，基督宗教對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參與乃時不我待，勢在必行。

三、基督宗教與“中國化”

對比國際發展，與基督宗教視野相關聯的中國當代發展，其關鍵詞當然是“中國化”。作為世界性第一大宗教的基督宗教，其在中國發展中有沒有必要“中國化”，為什麼要“中國化”以及究竟如何“中國化”，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重大問題，關係到基督宗教在當代中國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如果能夠審時度勢地冷靜分析，則不難看到中國當今發展給基督宗教理順其與中國社會及文化的關係提供了絕好機會，如果不及時完成其“中國化”的華麗轉身，則會錯失良機，留下難以彌補的遺憾。

基督宗教雖然自我宣稱為“普世宗教”，卻仍有其“在地化”、“處境化”的義務和使命。其世界傳播的歷史，也是自身不斷處境化、地域化適應、變化的過程。特別是基督宗教在華傳播的歷史軌跡，亦提醒其中國化的重要和必要。其理由至少包括如下幾點：

第一，從基督宗教中國化的社會政治原因來看，基督宗教與中國政治的深層面心結未解，留有不少可能發生糾纏、導致碰撞的疙疙瘩瘩，當代中國社會對基督宗教至少仍存在潛意識的政治警惕和相應排拒。究其原因，在於基督宗教作為信仰社團本來就是重要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力量，它並不存在於政治真空之中，而擺不脫其複雜、多變的政治處境；特別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基督宗教傳華被認為與西方政治反華脫不掉干係，這種關聯被不斷肯定，並且直至今日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續。在政治及文化這兩大層面，基督宗教在中國都仍未獲得如佛教那樣的信任，雖然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基本上擺脫了對西方的依附，但在中國社會教內外，這種彼此不信任感和距離感仍舊是心照不宣，雙方在猜忌、試探中共進，相互之間會客客氣氣，但也小心翼翼，不會也不敢深交，其長期以來所造成的心靈撕裂在眼下仍很難彌合。所以，基督宗教在面對中國社會對其在政治層面上的隔膜時，還需要足夠的耐心和必要的冷靜，如何使自己達到其政治層面的中國化乃是首選，這一了斷可以起到快刀斬亂麻、四兩撥千斤的神奇作用。但對這種適應及其真正“中國化”，基督教會中似乎仍有抵觸和對抗，不合作的選擇仍很強烈，尤其是海外教會的抱怨和反感，暴露出其對政治智慧及敏銳感的嚴重缺失。基督宗教如果在政治上仍要選擇反中國化或非中國化之路，將會面臨多蹇命運。

第二，基督宗教在思想文化上中國化的任務尚未完成，歷史上其輸入傳送的意識要遠遠強於其接受吸納的意願。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的確也傳入、輸進許多印度思想文化理念及語言邏輯表達，然其對中國思想文化也持完全敞開之態，融入了大量中國元素，以致通過漫長的磨合而使中國人不再覺得佛教是外來宗教，佛教本身也形成強烈而自覺的中國意識、中國感覺，不再有外來宗教之虞。來中國的基督宗教自耶穌會開始有著自覺、主動對話中國思想文化的意向，但這一過程剛剛開始就因“禮儀之爭”而夭折，導致歷史的遺憾和今天必要的補課。雖然今天仍有人認為耶穌會適應中國文化乃另有所圖、暗藏取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謀劃，但這種意欲僅在開端，若文化對話交流真正深化，其走向和結局則很難預料，並不必然是“吃掉”中國文化的結果。既然歷史是這樣的走來，那麼基督宗教今日就仍然需要接著走下去，有必要完成其融入中華思想文化傳統這一歷史任務。其實，這種在思想文化上的對話與溝通，完全可以帶來雙贏，並不會有誰真正徹底“吃掉”誰的後果，而只可能是交融互滲，彼此包容，有機合一。因此，基督宗教在思想文化深層面走入中國，是其在華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其真正可持續發展之路。

第三，基督宗教的中國化還需有其民族意識上的轉型，中華民族意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特別因其近代的弱勢挨打這一挫折經歷而使之有著更強的民族自尊、自強、自立的心境。其心靈的觸動關涉與基督宗教的交往，所以對這種強烈的民族感情、民族自尊更要有特別的注意和尊重。西方列強侵華史客觀上導致基督宗教曾染指其“文化侵略”，西方教會歷史上曾在華取居高臨下之勢，那種包辦代替、頤指氣使給中國人留下了心理陰影，至今記憶猶新。而當前國際上民族意識加強、民族之間的紛爭加劇，因而對中國基督徒之中國民族意識的提醒或喚醒乃是一種大勢。過去中國半殖民半封建時期那種“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現象切不可因為今天的海外移民而重演，海外華人基督徒及其華人教會在這種敏感時刻、以其敏感身份，更需要一種“海外赤子”的見證。在基督信仰問題上，遠走他鄉之華人的灑脫，卻不要成為持守鄉土之士的負擔，中國人走到天涯海角，都需保留一份鄉情、鄉愁和鄉思；一個好的中國基督徒，理應是精神氣質上和文化修養上的中國人。中國人跨境而不忘祖，仍留有其民族情結和氣節也是久遠中國優秀傳統的有機部分。在今天有上千萬華人分佈世界各地，其中不少成為基督徒的情況下，這種心靈溝通和相互關照，在正確認識基督宗教中國化的民族意義上已經具有迫在眉睫的需求。

第四，基督宗教的中國化關涉到中國教會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中國教會的多元走向已是不爭的事實，其間就涉及到這些教會究竟走向何方的問題。中國教會在近代曾嘗試創辦各種本土教會、本色教會和自立教會，道路艱險，沉浮各異，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三自愛國教會才確定了中國當代教會的底色。無論其成功與否，這都是中國教會建設發展的積極實踐，其旨歸就是基督教會要在中國社會紮根成長；其實，中國化的教會在今天也仍然是多姿多彩的教會，在中華民族、中國社會的大範圍內保留著濃郁的地方特色與民族氣質。甚至海外華人教會在於其本土適應之際，亦可嘗試如何推進其中國本色教會的創建。

第五，基督宗教的中國化還必須與時俱進，跟上時代的發展變遷。中國社會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變化巨大，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和多元，而中國教會正是乘改革開放的東風才得以重新崛起，經歷了全新發展，並以這種新的面貌步入了二十一世紀；改革後的中國社會充滿了活力與動感，人們的思想見識開闊開放，這種時代發展促使中國教會必須及時調整自己的心態和前進步伐，不能停留在改革前的思想認識，也不能僅僅滿足於教會內涵式發展的自娛自樂和自我滿足。這種隨中國社會發展的改進一方面包括中國教會的自我改革，理順教會內部教義神學思想、禮儀禮規和教務管理的關係，具有現代教會的發展意識；另一方面則要積極適應中國當代社會的迅猛發展，跟上隨之而來的問題意識和任務要求，見證並推動社會的積極發展，服務於快節奏發展中人們的精神需求和靈性修養，幫助解決這一發展中經濟及精神上弱勢群體的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奉獻教會及時、清新的靈性關懷、精神安慰和信仰渴求。基督宗教的中國化應該是充滿現代活力的中國化，使其深厚的歷史積澱轉換為當代特色鮮明的勃勃生機。

第六，基督宗教的中國化是充滿思想蘊涵的中國化，在其神學上必須有體現中國精神、中國意識的創意。當今“中國神學”建設內容豐贍，範圍極大，已不再是過去對西方神學的翻譯、詮釋、借鑒和採納。以往中國教會吸收、借鑒、採用的多是西方神學，自我意識和自我創見不強，民族色彩不濃，因而需要補充中國智慧，彰顯中國精神，體現中國思想特色。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世界神學曾見證了由西方神學到亞非拉美神學的遷移，“第三世界神學”曾一度活躍，神學的地方色彩鮮明、清新。這一發展也曾影響到中國的神學創建，但因“十年文革”而一度夭折，即使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也未見再現高潮。對中國神學建設具有筆路藍縷之功的吳耀宗、王治心、趙紫宸、丁光訓等人先後辭世，新中國新時代神學的構建仍未完成，新的一代教會思想家神學建設使

命依在，任重道遠。如果在中國社會發展空前活躍的今天卻沒有反映這一特點的中國神學出現，則會愧對這一歷史時機。

總之，基督宗教的中國化是對當今中國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積極應對，是對建設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共同體的積極參與。“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積極有效地在全球化時代參加並引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首先則需要搞好中國自身的建設，包括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只有打好我們自己的基礎，以中華民族自身的團結、富強為資本，才可能有實力走向世界，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弄潮兒、引領者。在此，中國基督宗教乃義不容辭，是其見證、有為的大好時機。中國化並不要消解從外而傳入的基督宗教，而是使之有更好的適應，做出融入社會、與中國共同發展前進的積極貢獻。在一個需要現實根基的真實世界，基督宗教的“普世情懷”在華則須基於其“中國心”的基本定位，而“人類拯救”之夢也需要以追求實現“中國夢”而得以圓夢。

在研討基督宗教與中國化的關係及關聯時，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基督宗教與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究竟應該如何聯繫起來，基督宗教應該怎樣去參與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等問題。面對世俗化的挑戰和衝擊，世界基督宗教衰弱之勢頗為明顯，而中國的基督宗教卻呈現出一種奇特的興盛，由此而給整個基督宗教世界帶來啟迪和期望。中國社會的轉型亦出現了新的問題，其貧富不均、金錢至上、實用傾向、功利主義、社會冷淡、人世炎涼等發展趨勢的抬頭，已給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共建帶來了障礙和阻力，對此，基督宗教的社會關愛、慈善事業和對底層弱勢群體的使命並沒有過時，反而更加需要，且更應該加強。在此，基督宗教對參與中國化發展的態度和選擇，實質上就是其對待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態度和取向，迫切需要的不是其麻木而乃其熱情。這已成為檢驗基督宗教與中國究竟有什麼關聯、能否融為中華一體的試金石。

四、基督宗教與“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提出，是當代中國積極理順其與世界關係的一種建設性嘗試。實際上，參與這一國際合作的國家和地區遠遠超過海陸絲綢之路沿線的60多個國家，體現出一種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中華文化精神。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主旨演講中指出：“古絲綢之路跨越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黃河和長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信眾的匯集地，跨越不同國度和膚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種族求同存異、開放包容，並肩書寫相互尊重的壯麗詩篇，攜手繪就共同發展的美好畫卷。”^①其實，歷史悠久的絲綢之路更多體現出的是精神傳播、文化交流之路，在這一古老之路上曾經最為活躍的行者就是各種宗教的傳播者。除了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這世界三大宗教經由絲綢之路的傳播之外，歷史上還留下了許多其他宗教傳播的身影。在這條溝通中外的路上，基督宗教的傳播者也曾屬於其最為繁忙的旅行家。

追溯到景教最初的來華之旅，基督宗教從此就與絲綢之路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傳播之途也是與不同文化比較、相互交流和吸納之旅。“景教”本是典型的中國術語，其歷史之用乃反映出中國古人對基督宗教受古代波斯宗教信仰薰染後東來的體認及理解。這裡已經留有多元文化交融互攝的痕跡。天主教自元朝傳入中國，其傳教士也是經歷了陸海絲綢之路的艱苦跋涉，沿途接觸到更多的民族及其文化，由此而展開了中西文化的深層面交流，並擴展到對更多民族文化及其精神

生活的接觸和瞭解。《馬可波羅遊記》及前後來華傳教士的手記，對絲綢之路風土人情有著生動精彩的描述，傳為古代絲綢之路的佳話。明末清初以耶穌會為代表的天主教東傳，使以絲綢之路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達到高潮。天主教傳教士所推動的“西學東漸、東學西傳”，使歐洲人真正瞭解到代表中華信仰傳統的儒教、道教等宗教精神，開始在多方面受到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中國人亦大開眼界，形成新的世界觀、宇宙觀，開始對西方學問的全面探究。這一時期的東西交流奠定了中國與西方系統瞭解的基礎。其在鞏固陸地絲綢之路作用的同時，海上絲綢之路的意義也得以凸顯。而在天主教經海上絲綢之路來華的歷史上，澳門曾有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當時所處的“大航海”時代，澳門成為連接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而且在文化史上亦乃西方漢學之肇端，其實施這種研究的天主教學院實質上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始。基督宗教與海陸絲綢之路的這段淵源，為今天中外文化交流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積澱，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

當中國現今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展開國際合作時，基督宗教的這一關聯史仍在延續。從陸上絲綢之路沿途國家和地區來看，大多信奉基督宗教（尤其是東正教或天主教）的包括愛沙尼亞、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波蘭、俄羅斯、格魯吉亞、捷克、克羅地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馬其頓、摩爾多瓦、黑山、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烏克蘭、匈牙利、亞美尼亞等 20 個國家或地區，其中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有著伊斯蘭教、東正教和天主教等信仰並存交織的複雜局面。而從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聯的國家或地區來看，大多信奉基督宗教各派的則包括埃塞俄比亞（其中人口的 45% 信奉東正教，40% 以上為穆斯林）、澳大利亞、比利時、德國、東帝汶、法國、菲律賓、荷蘭、瑞士、西班牙、新西蘭、義大利、英國等 13 個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及地區的基督宗教信仰使“一帶一路”有了與整個基督宗教世界的複雜關係，而其對待“一帶一路”發展的態度也會直接影響到中國與世界的這一合作。

“一帶一路”的提出並非緬懷過去的“思古之幽情”，而是有著重要的現實考量。不少國家積極參與，也有一些國家在猶豫、觀望和彷徨。雖然“一帶一路”主要基於經濟、政治上的合作，但若無文化上的理解、宗教層面的關注，則很難持續發展、長期堅持。所以，絲綢之路沿途及相關地區的宗教形勢分析評估，在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時必須認真考慮和特別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宗教現狀及其宗教文化傳統，會影響到這種政治經濟合作，其中雖然伊斯蘭教所涉及的範圍較大，而基督宗教信仰的作用亦不可小覷。實際上，這也是世界基督宗教重新調整與中國關係的一個重要機遇，應該主動抓住這一契機而有所作為。同理，中國的基督教會在這種大規模的“走出去”之探中完全可以續寫基督宗教促進中外友好交流的史話，緩解世界緊張局勢，贏來新的和平發展，共同改變世界經濟、政治所處的僵局。雖然基督宗教的全球性影響已不如過去，卻仍然有著積極發聲、影響輿論、推動社會變革發展的能力。世界的話語不該一直聚焦於各地各種暴恐活動及其背後的宗教勢力或宗教影響，給世界對宗教的現代審視帶來誤導和偏見。為此，包括基督宗教信眾的“沉默的大多數”應該行動起來，積極發聲，以尋求、維護和平、穩定、安寧的正義之力來壓倒暴恐勢力的猖獗，改變宗教在民眾中的形象和印象，推動並保障國際社會的良性發展，使我們生存的地球能夠確保平安。對此，“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是擺脫世界窘境的創舉，可以帶來“柳暗花明”、充滿希望的未來願景。世界範圍的基督宗教若能參與其內並積極發揮作用，則可重新推動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佛教等世界宗教的對話，使世界整體重返“對話”時代，緩解國際緊張局勢，並由此而重塑基督宗教自身的形象，再現其國際影響。如若

在這些關鍵發展及其稍縱即逝之時機上仍然熟視無睹、無動於衷、無所作為，相關的信仰傳統、價值體系則可能脫離時代潮流和社會主流，難免其頹廢、隳沉之勢。百舸爭流、大浪淘沙，古老的信仰有必要煥發青春、跟上時代，故此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揚帆“一帶一路”航程時，基督宗教乃面對著新的潮起潮落，其理應乘潮漲而高揚。

綜而述之，基督宗教在當代社會變遷中有著新的機遇，可做新的選擇。這在世界如此，在中國依然。從整體來看，基督宗教面對世界的發展、中國的巨變，反應較為平淡，其社會的參與和作用也不如以往那樣明顯，給人一種在當今世界舞臺上退隱的印象。與之相關聯，世界與中國對基督宗教的關注及關心也大大減少，形成對其認知的邊緣化，持一種淡然之態。這促使人們重新反思二十一世紀究竟是“世俗化”時代的延續，還是所謂“第二軸心時代”的宗教“複魅”？這種評估充滿著困惑及不定因素，有待進一步觀察審視。至於基督宗教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尚未步入其正常軌道。由於對其“中國化”的茫然或不確定，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發展上的巨變明顯拉下了距離，需要奮起直追。至於其底層、草根範圍的迅猛發展，卻呈現出一種無序、失控的走向，故而只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擔憂、猜忌和疑慮，甚至促使基層政府組織加強對其“境外滲透”的防範，而相應的積極評價似乎微乎其微，也難顯其正能量之在。因此，基督宗教在當代國際發展中並沒有止住其向社會邊緣滑動之步，對其誤解並未減少，對其淡忘卻在增大。應該說，當代發展機遇仍然很多，中國對基督宗教的認知評價也還充滿變數，對此，無論是世界範圍的基督宗教，還是中國境內的基督宗教，不知是否真正認識到、也不知真正準備好了沒有？

①Mark Juergensmey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Religions*, “Acknowledg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Mark Juergensmeyer ed., *Global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3.

③參見《世界倫理宣言·導言》，1993年9月4日芝加哥世界宗教議會通過。

④漢斯·昆：《世界倫理構想》，周藝譯，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第IX頁。

⑤漢斯·昆：《世界倫理構想》，第196頁。

⑥王鶴：《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2年，第1頁。

⑦習近平：《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學習活頁文選》，北京：《黨建》雜誌社，2017年5月16日，第8頁。

作者簡介：卓新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中國宗教學會會長，太湖世界文化論壇副主席。北京 100732

[責任編輯 陳志雄]